

重大不利事件的体验对个人消费的影响

李 慧 叶初升

摘 要 消费是牵引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我国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三年新冠疫情的经历体验可能改变一些民众的消费倾向,影响当下和未来的消费。1959-1961 年的大饥荒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距离当下久远,为讨论新冠疫情等重大不利事件的经历体验对个体消费行为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借鉴。大饥荒重塑了经历者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对经历者的消费水平产生了长期负向影响,尤其是在三组分类中,对非稳定收入家庭的个体、处于中等社会经济水平家庭的个体以及女性经历者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但数字支付的使用却可以缓解这一负向影响。因此,后疫情时代扩大内需应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着力促进居民尤其是女性收入稳定增长,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压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 消费经济;消费低迷;经历体验效应;大饥荒;消费倾向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5-008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1)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牵引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我国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即使在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的 2023 年,家庭收入得到较快修复,但消费仍然没有相应回升。可见,仅仅从收入这个角度还不足以解释当前的消费低迷。解释消费低迷的另一个角度是消费心理。消费心理学指出,一个人过去经历体验特别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经历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重塑个人的消费行为。据此可以推测,三年新冠疫情的经历体验可能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些民众的消费行为倾向,影响了当下和未来的消费。受限于疫情后数据时间较短,现有研究^[1](P38-48)^[2](P19-26)无法充分展现新冠疫情对个人消费心理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消费效应。因此,需要根据相对久远的重大不利事件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来间接推测疫情冲击可能会对人们消费行为带来的长远影响,为当前及未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提供更有效的参考。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距离当下较为久远,对于讨论新冠疫情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塑造及其长期影响具有参考价值。国内外关于大饥荒对个体消费行为影响的直接研究较为缺乏,更未具体分析其对消费心理的塑造过程^[3](P119-132)。因此,本文从经历体验效应的视角考察大饥荒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剖析并验证个体经历通过塑造习惯偏好而影响消费行为的内在机制,以史为鉴,为新冠疫情后消费低迷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以期为后疫情时代刺激消费提供更有利的政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低迷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学者从收入、流动性约束、人口结构、金融知识等视角解释消费低迷,还有大量文献从消费心理视角分析消费低迷的成因。

一部分研究者关注生活环境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有研究发现,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传统农耕生产所产生的集体主义文化会增加居民自控能力和储蓄倾向,降低消费率^[4](P80-92)^[5](P134-146)。这种观点有助于理解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一般特征,但无法解释我国消费在不同时期或增或降的趋势性变动,因而不能解释当下的消费低迷。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生活环境中周围群体的影响,出现相互攀比、相互学习的趋势^[6](P533-546)^[7](P22-31)。这种观点有助于理解消费低迷的扩散,但没有说明消费低迷何以产生。

另一部分研究者把当下的消费行为与过去关联起来,关注消费行为本身的惯性。有研究表明,过去消费行为会产生一种“棘轮效应”,使个体消费行为具有某种刚性特征,形成所谓消费习惯,即使面临经济波动或冲击甚至收入下降时,也会尽可能保持过去的消费水平^[8](P17-35)^[9](P60-75)。不过,这部分文献往往在理论模型中直接将消费习惯表示为过去消费的函数,并没有解释过去消费塑造消费习惯的机制。近年来,关于个人经历影响消费倾向的研究可以视为弥补这一缺陷的努力。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重大不利事件冲击对经历者消费心理的影响,但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甚至结论相左。有的研究认为,重大不利事件会使经历者形成及时行乐的心理而增加消费支出^[10](P80-99)^[11](P20-32);有的研究则认为重大不利事件经历会增加经历者非理性的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3](P119-132)^[12](P145-169)。鉴于存在相反的结论,Filipski等为了更好地分析经历者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将生命周期模型扩展成一个包括自然灾害引起未来经济损失概率的模型,分析经历者在预期未来损失概率或死亡概率变化中对消费和储蓄的最优选择^[13](P107-128)。该模型中,对损失概率和死亡概率的预期是外生的,没有解释这种预期产生的原因。

重大不利事件经历对人们消费的影响可能因事件类型不同而具有差异化特征^[11](P20-32)。目前国内关于重大不利事件对个体消费的影响研究,多限于自然灾害事件,比如地震^[10](P80-99)^[12](P145-169)^[13](P107-128)^[14](P55-70)。大饥荒和新冠疫情虽是重大不利事件,但与自然灾害不同,它们的波及范围更广、对生命健康的威胁更具持续性^[2](P19-26)。

有一类关于经历体验效应的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个人经历影响消费提供了研究方法。Malmendier和Nagel构建经历体验效应理论模型,将个体的“信念”视作“经历”的函数,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冲击的个人经历是否会影响经历者的金融风险承担程度^[15](P373-416)。在国外,经历体验效应除了应用于研究金融投资领域,还广泛运用到了社会态度、预期形成、政治认同等方面^[16](P774-809)^[17](P1615-1639)^[18](P267-284)。而国内研究相对较少,消费领域的研究尤为缺乏。经历体验效应结合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大脑神经对个人经历极为敏感,恰好可以为从个体角度深入剖析个体经历影响消费的内在机制提供有力工具。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试图在如下几个方面做探索:第一,消费习惯形成理论一般假设消费习惯是由过去的消费形成,本文从经历体验效应视角出发,以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为作用机制,解释过去的消费如何塑造了消费习惯。第二,与Filipski等的模型^[13](P107-128)相比,本文放弃了未来风险预期的外生性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将“信念”变为“经历”的函数,解释经历者预判风险“信念”的来源。第三,目前经历体验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金融投资、社会态度等领域,本文将其应用于分析消费,不仅扩展了经历体验效应的研究领域,也为研究消费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

大饥荒的经历究竟如何影响了个人消费?本部分将在介绍大饥荒的背景之后,建立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一) 1959-1961年大饥荒背景介绍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给新成立的中国带来了深重的伤

害,成为一代乃至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1959-1961年三年久旱,农业生产大量减产,同时,由于面临工业化的急功近利和农业“浮夸风”的冲击,农业资源过度转移,农村余粮提前消耗殆尽,引发最初的饥荒^[19](P170-18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家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应对饥荒。首先是减少粮食消费,尽量使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生存下去。同1957年相比,1960年农民消费水平下降22.8%,1961年下降21.4%,非农民消费水平1961年下降26.1%,1962年下降23.5%^[20](P55)。其次是扩宽粮食获得渠道。饥荒期间,城市家庭除了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外,可以用货币购买高价商品,或通过非正规市场交易来获得额外的食物。在农村,家庭生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上缴公粮后保存一定的余粮。非正规市场交易方面,由于饥荒时期粮价飙升,而农民贫困,微薄的货币储蓄对家庭生存的帮助不大^[3](P119-132)。

经历体验效应理论指出,大脑对经历极为敏感,人们的所作所为和经历的影响可以从小分子水平的变化影响大脑神经的重构。当过去经历的影响足够强烈,或者类似的场景反复出现增加记忆,经历带来的影响会长期存在。经历事件所产生的感受会产生记忆锚定并内化为一种信念,并可作为影响偏好和决策判断的信息,且这种内化后的信息比人们从外部学习的信息对人们的偏好塑造和决策判断影响更加重要^[15](P373-416)。经历体验效应应有以下特征:(1)一生中的经历对个人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信念和选择存在长久影响;(2)经历的影响与事件距离当下时间远近、程度大小和频率多少有关;(3)即使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专家在做决策时也会受到经历的影响;(4)经历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1](P2857-2894)。

消费行为作为消费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行为,会受到人们经历的影响。大饥荒时期人们经历的受灾程度越大,感受越深刻,消费行为受到的影响也越大。为了增加生存几率,人们一方面减少当前的粮食消费以为未来留下口粮,逐渐改变了时间偏好;另一方面,非正规市场交易粮食的经历,让人们认识到货币储蓄的重要性,加大饥荒本身的经历,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风险偏好。根据经历体验效应理论可推测,大饥荒时期所经历的沉重伤害和采取的应对途径,会内化为经历者的一种信念,长期影响经历者的消费倾向,并且这种影响可能会存在异质性。

(二) 基于经历体验效应的模型构建、理论分析与假说

为了说明经历体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本小节在标准随机生命周期消费模型框架下构建经历体验模型,模拟经历体验通过改变偏好对消费产生影响。

1. 劳动收入不确定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本文借鉴Carroll等^[22](P61-156)、Carroll^[23](P1-55)和Malmendier & Shen^[24](P322-355)的做法,构建劳动收入不确定的生命周期模型。假设有 $t = 1, \dots, T$,消费者在 $t = 1$ 期出生,工作到 T 期,在每个 t 期获得劳动收入 Y_t 。在 T 期之后,消费者退休,并活到 $T + N$ 期。在每个 $t = T + 1, \dots, T + N$ 期有固定的退休收入 $Y_t = Y \geq 0$ (例如养老金等)。在每个时间点 t ,消费者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最优消费 C_t 来最大化其预期和可分时间的终身效用。消费者进入每一个时期的财富来自前一个时期的剩余 A_t ,并收到收入流 Y_t ,然后消费 C_t 并获得净财富的实际利息 $r(A_t + Y_t - C_t)$ 。消费者一生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max \sum_{k=0}^{T+N-t} \delta_{t+k}^k E_t[u(C_{t+k})] \quad (1)$$

$$s.t. C_{t+1} = (1+r)(A_t + Y_t - C_t) \quad (2)$$

$$A_t \geq 0 \quad (3)$$

式(1)中参数 δ_{t+k} 表示 $t+k$ 期的主观贴现系数,刻画消费者不同时期的时间偏好, $u(C_{t+k})$ 代表 $t+k$ 期的消费效用。式(2)为动态预算约束。式(3)为借款约束,当 $A_t < 0$ 时,表示借贷, $A_t \geq 0$ 时,表示财富剩余。为了简化模型,本文排除了借贷的情况,以防混淆信贷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和经历体验对消费的

影响^①。

参考易桢和朱超等学者的做法^[25](P150-164),假设效用函数 $u(C_{t+k})$ 满足:

$$u(C_{t+k}) = \frac{C_{t+k}^{1-\rho_{t+k}}}{1-\rho_{t+k}} \quad (4)$$

式(4)为标准CRRA函数形式,即相对风险规避函数,其中 ρ_{t+k} 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刻画消费者不同时期的风险偏好。

模型中的收入 Y_t 由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文献中广泛采用的外生过程决定^[22](P61-156)^[23](P1-55),表示为:

$$Y_t = D_t U_t = D_t W_t S_t \quad (5)$$

式(5)中, D_t 表示永久收入部分, U_t 表示不确定收入部分,两者相互独立。当 D_t 满足 $P_r(D_t > 0) = 1$ 时,为任意阶段的马尔科夫过程。 $U_t = W_t S_t$,其中 W_t 表示就业,满足参数为 p 的伯努利分布, $W_t \sim \text{Bernoulli}(p)$, $p \in (0, 1)$ 。 S_t 表示一个 $E[S_t] = 1$ 的非负过程。因此,当消费者在时期 t 受到事件冲击导致失业($W_t = 0$),则收入 $Y_t = 0$;当没有受到事件冲击保持就业($W_t = 1$),则收入 $Y_t = D_t S_t > 0$ 。

2. 基于经历体验的信念形成。基于经历体验的学习者根据生活中的经历,包括当下的经历,在 t 期形成 $t+1$ 期冲击事件不发生的信念 p_t ,且近期经历和久远经历对信念的影响存在权重的差别。具体表示为:

$$p_t = \sum_{k=0}^{t-1} \omega(\lambda, t, k) W_{t-k} \quad (6)$$

式(6)中, $\omega(\lambda, t, k)$ 表示 k 时期到 t 时期经历对信念影响的权重, λ 表示加权函数的参数。参考Malmendier和Nagel的做法^[15](P373-416),将加权函数表示为:

$$\omega(\lambda, t, k) = \frac{(t-k)^\lambda}{\sum_{k=0}^{t-1} (t-k)^\lambda} \quad (7)$$

式(7)中, $\lambda > 0$,表示距离 t 时期越久远的经历对当下信念的影响权重越小,经历越近,权重越高。

经历体验所形成的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所以将式(1)中表示时间偏好的贴现系数 δ_{t+k} 表示为信念 p_t 的函数 $\delta(p_t)$,将式(4)中风险厌恶系数 ρ_{t+k} 表示为信念 p_t 的函数 $\rho(p_t)$ 。

基于经历体验的学习者,在时期 t 有冲击事件不发生的信念 p_t 认为收入 $Y_t = D_t S_t > 0$;有受到事件冲击的信念 $(1-p_t)$ 认为自己可能会失业($W_t = 0$),导致收入 $Y_t = 0$ 。所以将式(5)的收入 Y_t 改写为预期收入的形式,如式(8)所示:

$$E(Y_t) = p_t(Y_t = D_t S_t > 0 | W_t = 1) + (1-p_t)(Y_t = 0 | W_t = 0) \quad (8)$$

3. 均衡分析。用推导欧拉方程的方法,将式(1)和式(4)分别求导,化简后得到以下方程:

$$\frac{C_{t+1}}{C_t} = [(1+r)\delta(p_t)]^{\frac{1}{\rho(p_t)}} \quad (9)$$

将欧拉方程式(9)与预算约束式(2)和式(8)结合,得到 C_t 的方程式:

$$C_t = \frac{(1+r)[A_t + E(Y_t)]}{1+r + [(1+r)\delta(p_t)]^{\frac{1}{\rho(p_t)}}} \quad (10)$$

式(10)中,因为 $\rho(p_t)$ 、 $\delta(p_t)$ 和 $E(Y_t)$ 都是信念 p_t 的函数,信念 p_t 是事件 W_{t-k} 的函数,所以无法得到唯一确定的解,需要继续探索消费与经历 W_{t-k} 之间的关系。

将消费 C_t 关于经历 W_{t-k} 求导,得到如下关系:

① 根据Malmendier和Nagel的假设,预计年轻群体对特定冲击的反应会比年长群体更强烈,相对于年长群体,他们的借贷能力更受限制^[15](P373-416)。通过完全排除借款,本文在最严格的情景下进行分析。

$$\frac{\partial C_t}{\partial W_{t-k}} = \frac{\partial C_t}{\partial \delta(p_t)} \frac{\partial \delta(p_t)}{\partial p_t} \frac{\partial p_t(W_{t-k})}{\partial W_{t-k}} + \frac{\partial C_t}{\partial \rho(p_t)} \frac{\partial \rho(p_t)}{\partial p_t} \frac{\partial p_t(W_{t-k})}{\partial W_{t-k}} + \frac{\partial C_t}{\partial E(Y_t)} \frac{\partial E(Y_t)}{\partial p_t} \frac{\partial p_t(W_{t-k})}{\partial W_{t-k}} \quad (11)$$

从式(11)中可以看出,经历会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不发生概率判断的信念,通过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预期收入影响消费。当过去重大事件发生越多,对事件不发生的信念 p_t 越低, $\frac{\partial p_t(W_{t-k})}{\partial W_{t-k}} < 0$;随着事件不发生的信念不断下降,未来预期收入随之下降,按照收入效应,消费随之下降, $\frac{\partial C_t}{\partial E(Y_t)} \frac{\partial E(Y_t)}{\partial p_t} > 0$ 。

重大不利事件冲击对个体风险偏好影响的研究中,存在截然相反的结果。有学者研究表明重大不利事件冲击将导致个体的风险偏好增加,如Chen等认为大饥荒的经历者由于获得有利于应对风险和适应风险的技能,更具有冒险精神^[26](P3393-3430)。有的学者研究结论则相反,认为重大不利事件让经历者留下恐惧体验,一方面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在类似事件发生时会引起过去的回忆,都有可能导致风险厌恶心理。关于风险偏好对消费的影响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研究认为当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更需要增加即期的消费获得效用的满足与心理上的安慰^[11](P20-32)。有的研究则发现风险厌恶程度越高,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居民会更加偏好储蓄,将收入用于应对无法通过资产组合配置分散的风险,减少当下消费支出^[27](P175-192)。大饥荒带来的死亡威胁并不像自然灾害那样是瞬间且不可控的,那些对突发事件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更强的人将更有可能从大饥荒中幸存下来,正像Chen等^[26](P3393-3430)认为的那样,大饥荒的经历者可能会更具有冒险精神。在大饥荒中,为了增加生存概率,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非正规市场高价购买额外的粮食,换言之大饥荒可以通过资产的重新配置而成功应对,不像自然灾害和重大疾病那样是无法抵抗的。因此,大饥荒的经历者一方面更具冒险精神,另一方面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而选择相对风险更大但收益更高的资产配置方式。因此,可推测大饥荒增加了经历者的风险偏好,会使其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风险投资以期获得资产的增值,即 $\frac{\partial C_t}{\partial \rho(p_t)} \frac{\partial \rho(p_t)}{\partial p_t} > 0$ 。

重大不利事件冲击对个体时间偏好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研究观点。有学者研究表明重大不利事件经历者会更加偏好当下,及时行乐,增加当下的消费,如Filipski等发现经历了地震的农村家庭更加偏好现在,将更多的钱用在烟酒和麻将上^[13](P107-128)。还有一部分学者发现重大不利事件经历会使经历者更加偏好未来,增加当下储蓄并减少消费,如姚东旻等认为地震的经历会增加自我控制力以及认知能力而使经历者更加偏好未来^[12](P145-169)。在大饥荒的经历中,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并不是瞬间的,那些减少当前粮食消费尽可能延长有限粮食可食用时间的行为,能够增加在大饥荒中存活概率,因此,可推测大饥荒的经历会使经历者更加偏好未来,减少当期的消费,即此时 $\frac{\partial C_t}{\partial \delta(p_t)} \frac{\partial \delta(p_t)}{\partial p_t} > 0$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大饥荒经历会对经历者的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假说2:大饥荒经历通过提高经历者的风险偏好,对其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假说3:大饥荒经历通过降低经历者对当前的时间偏好,对其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部分将对所使用的数据、模型和变量进行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首先,主要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包含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该数据库不仅统计了受访者的信息,还包

括了受访者父辈、青少年时期的信息,有利于本文根据不同主体经历大饥荒时的家庭背景、生活状况等情况展开研究。其次,用于计算各省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受灾程度的死亡率数据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

两套数据匹配后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为了避免饥荒带来人口迁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剔除了有户口迁移的样本;第二,由于经历大饥荒时重庆市属于四川省,海南省属于广东省,所以重庆市和海南省在大饥荒期间的数据,使用四川省和广东省的数据代替;第三,剔除样本的缺失值以及极端值。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340个。

(二)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1959-1961年大饥荒是一个重大不利事件,在发生之前,没人能预测到大饥荒的发生,对于个体而言完全是一个外生性的冲击,因而可以作为一个随机性的自然实验。基于此,本文构建DID模型分析1959-1961年大饥荒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将经历过饥荒的个体设置为实验组,未经历过饥荒的个体设置为对照组。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lconsump_{ip} = \alpha_0 + \beta experi_i + \gamma EDR_p + \delta experi_i \times EDR_p + X_{ip}\alpha + v_p + \varepsilon_{ip} \quad (12)$$

式(12)中*i*为个体,*p*为省份,*lconsump*代表消费水平,*experi_i* × *EDR_p*刻画经历过饥荒的个体的受灾程度,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δ为核心估计参数,代表不同受灾程度对经历过饥荒个体的消费水平的影响。*X*代表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两个层面影响消费水平的各类因素。*v_p*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以控制同一地区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个人消费带来的影响。*ε_{ip}*代表随机扰动项。

各相关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式如下: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个体消费水平(*lconsump*)。鉴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一个家庭采访一人,且没有定义户主,本文将受访者定义为户主。由于数据库中缺少个人消费水平的数据,本文使用家庭平均消费水平代表受访者个人消费水平,用家庭总消费支出除以家庭成员数量后再取自然对数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经历饥荒虚拟变量(*experi*)和受灾程度(*EDR*)的交乘项。经历饥荒虚拟变量,1961年及以前出生的个体定义为1,为实验组,1961年之后出生的个体定义为0,为对照组。各省的受灾程度,用超额死亡率表示,参考Cheng等^[28]的做法,使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死亡率与饥荒前三年(1956-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之差得到。测量尺度为1‰,因此*EDR*每增加一个单位就意味着每千人多死亡一人。经历大饥荒(*experi*)和受灾程度(*EDR*)的乘积表示经历大饥荒的个体的受灾程度。

(3)控制变量。本文参照现有文献,分别从个人、家庭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sex*),男性为1,女性为0;户籍(*hukou*),农业户口为0,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为1;婚姻状况(*marriage*),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为1,未婚、离婚、分居未离婚、丧偶为0;年龄(*age*);相对收入水平^①(*society_level*),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个级别,分值为1-5分;社会保障(*insur*),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为1,否则为0。家庭层面,包括家庭规模(*family_scale*)、取对数后的家庭人均收入(*lavg_income*)、家庭抚养比(*ratio_child*,未成年孩子数占家庭成员数的比例)。

(三)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不难看出,我国不同省份在三年饥荒期间的受灾程度差别较大,最小值为0.57,最大值为56.7。此外,在样本的性别构成上,男性样本占49.2%,与我国性别结构大

① 变量来自CGSS2018调查问卷中“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个级别,分值为1-5分。

致相符,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lconsump</i>	2340	9.0390	1.1000	3.0450	15.4200
解释变量	<i>experi</i>	2340	0.4080	0.4920	0	1
	<i>experi</i> × <i>EDR</i>	2340	5.6970	12.2900	0	56.7000
	<i>EDR</i>	2340	14.2900	15.8700	0.5700	56.7000
控制变量	<i>sex</i>	2340	0.4920	0.5000	0	1
	<i>hukou</i>	2340	0.3770	0.4850	0	1
	<i>marriage</i>	2340	0.8030	0.3980	0	1
	<i>age</i>	2340	51.6100	15.8900	17	117
	<i>society_level</i>	2340	3.7320	0.8700	1	5
	<i>insur</i>	2340	0.9650	0.1850	0	1
	<i>family_scale</i>	2340	2.8162	1.3903	1	14
	<i>lavg_income</i>	2340	9.2590	1.9290	0	14.8500
	<i>ratio_child</i>	2340	0.1140	0.1940	0	0.8330

四、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DID模型检验1959-1961年大饥荒对经历者消费水平的影响,对假说1进行检验。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大饥荒作为重大不利事件的冲击对经历者的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experi* × *ED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75和-0.0054,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1959-1961年大饥荒会对经历者的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经历大饥荒时死亡率每提高1%,消费减少5.4%,且这种影响在灾难结束后仍延续几十年,假说1成立。经历大饥荒的变量(*experi*)并不显著,说明并不是出生在大饥荒年代就会对个体未来的消费产生负向影响,而是要真实经历大饥荒才会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事件的影响效果首先需要满足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准自然实验开始之前的时间趋势一致,即事件发生前两组的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差异。由于1959-1961年大饥荒事件距今久远,无法构造面板数据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参考Chen等^[26](P3393-3430)的做法,将大饥荒结束后的四年中出生的个体与受灾程度交乘项(*Cohort_{iy}* × *EDR_p*)纳入基准模型式(12)中,构建如下方程进行验证:

$$lconsump_{ipy} = \alpha_0 + \beta experi_i + \gamma EDR_p + \delta experi_i \times EDR_p + \sum_{y=1962}^{1965} \theta_y (Cohort_{iy} \times EDR_p) + \sum_{y=1962}^{1965} \varphi_y Cohort_{iy} + X_{ipy} \alpha + v_p + \varepsilon_{ipy} \quad (13)$$

式(13)中,*Cohort_{iy}*表示1962-1965年出生的没经历过饥荒的个体,其余变量与原来保持一致。

表3列(1)为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1962-1965年出生的个体与受灾程度交乘项(*Cohort_{iy}* × *EDR_p*)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大饥荒发生及以前出生的个体与受灾程度交乘项(*experi_i* × *EDR_p*)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经历过饥荒的人才会受到大饥荒的影响,未经历过的个体不受影响,说明本文估计的大饥荒对消费的影响不是遗漏关键的系统性变量导致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i>lconsump</i>	<i>lconsump</i>
<i>experi</i>	-0.2220*** (0.0606)	0.0317 (0.0716)
<i>experi*EDR</i>	-0.0075*** (0.0028)	-0.0054** (0.0024)
<i>EDR</i>	-0.0144*** (0.0017)	-0.0045*** (0.0015)
<i>sex</i>		-0.0554 (0.0372)
<i>hukou</i>		0.4240*** (0.0447)
<i>marriage</i>		0.0399 (0.0537)
<i>age</i>		-0.0082*** (0.0021)
<i>society_level</i>		-0.1010*** (0.0245)
<i>insur</i>		0.0401 (0.1040)
<i>family_scale</i>		-0.1260*** (0.0157)
<i>lavg_income</i>		0.1820*** (0.0174)
<i>ratio_child</i>		0.2200** (0.1080)
常数项	9.3770*** (0.0360)	8.5150*** (0.2650)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2340	2340
R ²	0.0860	0.345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本文还参考Chen等^[26](P3393-3430)的做法,设计了一组安慰剂检验。以1962-1966年出生的个体为实验组,1967-1971年出生的个体为对照组。若大饥荒结束后出生的个体组成的实验组与大饥荒结束后出生的个体组成的对照组对比分析不显著,说明排除了同时影响经历过大饥荒和没经历过大饥荒的个体消费的遗漏变量。计量模型如式(14)所示:

$$lconsump_{ipy} = \alpha_0 + \sum_{y=1962}^{1966} \beta_y Cohort_{iy} + \gamma EDR_p + \sum_{y=1962}^{1966} \delta_y (Cohort_{iy} \times EDR_p) + X_{ipy} \alpha + v_p + \varepsilon_{ipy} \quad (14)$$

式(14)中 $Cohort_{iy}$ 代表1962-1966年出生的个体,使用样本数据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大饥荒结束后五年里出生的个体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不显著,安慰剂检验通过。

2. 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进行了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的代理变量、受灾程度的代理变量、选用子样本、更换实证方法在内的其他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考虑到大饥荒可能会通过影响长期收入,间接影响长期消费水平,因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消费/收入(*linc_consump*)做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1)所示, $experi \times EDR$ 回归系数为-0.0038,在10%水平

表3 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2)
	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
	<i>lconsump</i>	<i>lconsump</i>
<i>experi*EDR</i>	-0.0060** (0.0025)	
<i>Cohort62*EDR</i>	-0.0009 (0.0063)	0.0001 (0.0070)
<i>Cohort63*EDR</i>	-0.0080 (0.0060)	-0.0060 (0.0069)
<i>Cohort64*EDR</i>	0.0032 (0.0068)	0.0030 (0.0071)
<i>Cohort65*EDR</i>	-0.0045 (0.0075)	-0.0044 (0.0079)
<i>Cohort66*EDR</i>		0.0090 (0.0072)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8.5260*** (0.2650)	10.2100*** (1.827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340	579
R ²	0.3470	0.318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受灾程度	选用子样本	更换实证方式 tobit
	<i>linc_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experi</i>	0.0608 (0.0685)	0.1680 (0.1220)	0.0339 (0.0742)	0.0317 (0.0723)
<i>experi*EDR</i>	-0.0038* (0.0022)		-0.0071*** (0.0027)	-0.0054** (0.0024)
<i>EDR</i>	-0.0032** (0.0014)		-0.0031** (0.0016)	-0.0045*** (0.0016)
<i>experi*harm</i>		-0.5680** (0.2730)		
<i>harm</i>		-0.6170*** (0.17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1880*** (0.3040)	8.7200*** (0.2750)	8.6340*** (0.2710)	8.5150*** (0.205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80	2340	2155	2340
R ² /Pseudo R ²	0.3170	0.3460	0.3380	0.139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下显著，依然证实经历过饥荒的个体更容易减少消费。

为了减少关键指标衡量方法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本文参考程令国和张晔^[3](P119-132)的方法，使用

大饥荒期间出生人口(1959-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相对正常年份出生人口即大饥荒之前三年(1956-1958年)和大饥荒之后三年(1962-1964年)的平均出生率的减少程度(*harm*)衡量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替换超额死亡率变量(*EDR*)。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 $experi \times harm$ 系数为-0.5680,在5%水平下显著,结果依然证实经历过饥荒的个体更容易减少消费。

中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1958年前的宽松期、1958-1984年的严格控制期、1984-2001年的半开放期和2001年后的推进期。考虑到户籍制度开放后,人口迁移(户籍不变)使受访个体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会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本文参考程令国和张晔^[3](P119-132)的做法,剔除2000年人口普查中人口迁入最多的广东省和人口迁出最多的四川省,重新做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列(3)所示, $experi \times EDR$ 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由于CGSS2018调查问卷中消费支出最高不能超过一百万,具体数据存在截尾,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会受到限制,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检验大饥荒经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列(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

以上稳健性检验都支撑了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即假说1得到证明。

五、进一步分析

经前文理论分析可知,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历会通过影响经历者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对其消费水平产生影响,这一部分将对此机制进行检验。另外经历体验效应理论亦指出经历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那么大饥荒的经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会因为经历者的家庭、个人条件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当前支付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大饥荒的经历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接下来本文针对影响机制、影响的异质性和数字支付的调节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见表5和表6。

(一) 机制讨论

为了检验提出的风险偏好机制和时间偏好机制,本文仍然构建DID模型检验,在基准模型式(12)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换为 $risk_pre_{ip}$ (p 省个体 i 的风险偏好)和 $time_pre_{ip}$ (p 省个体 i 的时间偏好)。

1. 风险偏好。对于风险偏好($risk_pre$),本文采用CGSS2018调查问卷中的两个问题“充满风险和机会的生活比平凡而稳定的生活更令人向往”“即使是有风险,如果有多余的钱,我会投资在报酬高的东西上”的分数加总作为衡量指标。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数值“1-7”依次代表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7个程度,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 $experi \times EDR$ 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大饥荒会长期提高经历者的风险偏好,这与Cheng等的研究结论^[28]相似,说明本文结果具有合理性。

回归结果表明,大饥荒的经历使个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增加。一方面,风险偏好作为影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促使他们更多通过投资等方式处置财产,以期获得财产的增值,而不是消费^①,对消费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低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经历者对当前时间的偏好,降低未来消费效用折现因子,最终引起当期消费减少。从风险预期来看,更高的风险偏好有更强的风险承受心理,对未来死亡风险预期和财产风险预期更低,更不需要在当下提高消费强度^[11](P20-32),假说2得到验证。

2. 时间偏好。时间偏好是指对于相同的消费束,经济主体总是偏好现在超过未来,度量了人们将来进行贴现的程度。根据显示偏好原理,个人或家庭的现实决策(如消费与储蓄、长期规划等)可以为其实时间偏好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29](P1-25)。因此,众多文献使用家庭的长期财务规划等期限变量度量其

① CGSS2018调查问卷中关于支出的类别为“衣着支出”“食物消费额(包括烟酒、做饭)”“住房支出(购房、建房、租房、装修)及居住支出(房屋维修、水电、燃料等)”“交通(包括公共交通、汽油、过路费、汽车保养维修均摊等)”“消费品、休闲娱乐消费、电话通信费等”“子女教育支出及其他教育培训支出”“医疗(看病吃药)个人自付支出”,没有包括各种类别的投资。

表5 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风险偏好	时间偏好	非稳定收入家庭	稳定收入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社会经济地位中等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女性	男性
	<i>risk_pre</i>	<i>time_pre</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lconsump</i>
<i>experi</i>	0.2000 (0.2690)	0.0313 (0.0301)	0.0484 (0.0819)	0.1070 (0.1670)	0.0725 (0.0852)	0.0083 (0.1470)	-0.2790 (0.3300)	0.1810* (0.1000)	-0.1230 (0.1030)
<i>ex- peri*EDR</i>	-0.0176* (0.0099)	-0.0023*** (0.0008)	-0.0064** (0.0026)	-0.0079 (0.0088)	-0.0033 (0.0027)	-0.0165** (0.0065)	-0.0185 (0.0152)	-0.0081*** (0.0031)	-0.0026 (0.0037)
<i>EDR</i>	0.0122 (0.0075)	0.0021*** (0.0005)	-0.0050*** (0.0016)	-0.0003 (0.0032)	-0.0063*** (0.0018)	0.0009 (0.0027)	0.0109 (0.0077)	-0.0028 (0.0020)	-0.0064*** (0.00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6.7300*** (0.6020)	1.1160*** (0.0553)	8.7370*** (0.2860)	7.3610*** (0.7490)	8.4450*** (0.2980)	8.7320*** (0.5910)	5.6100*** (1.6540)	8.3620*** (0.3500)	8.6210*** (0.398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46	1546	1897	359	1758	470	92	1189	1151
R ²	0.0680	0.1430	0.3440	0.3320	0.3190	0.3540	0.4600	0.3680	0.335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时间偏好。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CGSS2018调查问卷中“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这一问题衡量时间偏好,回答“1”为“没有投资”,“0”为“有投资”。结果如表5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experi \times EDR$ 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大饥荒降低了经历者对当前的时间偏好。个体的时间偏好能够对其储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当个体对未来的效用表现出更强的偏好,将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反之,则会减少储蓄。以上结果说明大饥荒对经历者的时间偏好产生长期的影响,使经历者更有耐心、更偏好未来的效用,减少当期消费,假说3得到验证。

(二) 异质性分析

探讨大饥荒对不同特征经历者消费水平带来的影响差异,可以为当前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提供更详尽的微观证据。

1. 家庭收入稳定程度的异质性检验。收入相对更稳定的家庭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不同收入稳定程度家庭中的个体在经历大饥荒时面临的困难程度是不同的,其消费心理的形成也会产生差异。本文根据经历者父母的工作单位性质是不是事业单位^①对样本进行划分。根据CGSS2018调查问卷的选项,本研究将经历者父亲或者母亲的工作单位属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委会”“军队”的归类于“事业单位”,“企业”“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和“其他”归类为“非事业单位”。一方面事业单位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容易因为重大事件的冲击和时间的迁移而产生岗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工资的发放相对稳定,旱涝保收。表5列(3)和列(4)报告了家庭收入稳定程度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可见,父母不是事业单位的个体,消费水平受大饥荒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父母是事业单位的个体,消费水平受大饥荒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收入相对不稳定的家庭在大饥荒中受到的影响更大,经历体验更为深刻,对个体消费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检验。收入是影响整个家庭在大饥荒期间是否能够购买粮食最重要的

① 变量来自CGSS2018数据库中“您14岁时,您父亲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是?”“您14岁时,您母亲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是?”。

表 6 数字支付的调节效应

变量	数字支付
	<i>lconsump</i>
<i>experi</i>	0.0010 (0.0664)
<i>dig_pay</i>	0.3900*** (0.0505)
<i>experi*dig_pay</i>	0.0856 (0.0991)
<i>EDR</i>	-0.0045*** (0.0015)
<i>experi*EDR</i>	-0.0020 (0.0030)
<i>EDR*dig_pay</i>	0.0041 (0.0029)
<i>exper*EDR*dig_pay</i>	0.0145** (0.0065)
控制变量	是
常数	8.1520*** (0.260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2331
R ²	0.357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因素,决定着大饥荒对个体影响程度的大小。大饥荒发生距今久远,难以获得非常精确的事件发生时家庭收入的微观数据,所以本文采取CGSS2018问卷中“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这一最接近个体经历大饥荒时家庭收入水平且又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经历者所在家庭社会地位的变量进行样本分类。本文将问卷中1-4等级归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5-6等级归为“社会经济地位中等”、7-10等级归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以此将样本分为三类。表5列(5)至列(7)报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大饥荒对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的消费水平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余两组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或者更多途径获得粮食,大饥荒的经历对其影响不深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则截然相反,本就贫困、余粮不多,大饥荒发生前后都只是解决即时的生存问题;而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的家庭没有足够收入,也没有更多途径获得粮食,大饥荒发生后其生活状况恶化较此前会更为明显,大饥荒的经历体验会更加深刻,对消费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3. 性别异质性检验。大量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财富地位不同、对危机的敏感程度不同等,二者承受风险压力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30](P169-201)。本文对不同性别的经历者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列(8)和列(9)所示,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消费产生长期的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同样经历的男性则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原因可能与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有关,女性管理家庭日常支出,对大饥荒的经历体验更加深刻。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面对创伤和冲击,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大的痛苦^[31],大饥荒的经历对女性消费水平的影响比对男性影响更长久。

(三) 数字支付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支付数字化已成为一种潮流趋势。数字支付,尤其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

由于其便利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支付方式,悄然改变了消费者的支付习惯,提高了消费效率。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年)》,结果显示,65-69岁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超过五成,百岁及以上老人也有1.3%使用智能手机。这显示数字化发展与数字支付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大饥荒的经历者均超过了55岁,从目前来看大部分都步入了老年阶段。大饥荒对经历者消费的负向影响是否会随着数字支付而改变呢?

本文利用CGSS2018调查问卷中“在过去的十二月里,您有没有使用过微信支付?”“在过去的十二月里,您有没有使用过支付宝的移动支付功能?”两个问题,衡量“数字支付”(dig_pay),两者均不使用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结果如表6所示,dig_pay与 $experi \times EDR$ 的交乘项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支付可以减弱大饥荒对经历者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促进消费水平的增加。原因可能是支付数字化,增加了消费的便利性,减少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使用纸币的数量概念,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消费。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揭示重大不利事件的经历对个体消费产生的影响,本文以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历者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经历体验效应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运用DID模型与CGSS2018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重大不利事件冲击对个人消费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以期为后疫情时代如何刺激消费需求提供有益参考。研究发现:1959-1961年大饥荒通过提高经历者的风险偏好和对未来的时间偏好降低了经历者的消费水平,且该影响是长期的;大饥荒对经历者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对家庭没有稳定收入的个体、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个体以及女性的消费水平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支付有利于缓解大饥荒经历对个体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并促进消费增加。

基于以上结论,针对新冠疫情后消费需求恢复缓慢的现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稳定居民预期。重大不利事件的冲击不仅长期塑造经历者的消费倾向,影响经历者当下的消费水平,还会对经历者的未来预期产生影响。政府应该优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减少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科学引导消费者的政策预期、收入预期和需求预期,削弱消费的习惯性特征对边际消费倾向的负向影响。

第二,着力提高居民收入与社会保障水平,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更稳定的个体消费水平受到重大不利事件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要促消费,必须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多举措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为居民提供更有保障,减少居民的收入波动。

第三,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压力,发挥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大饥荒主要对中等社会经济水平家庭群体的消费水平产生负向作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重点,也是持续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的部分,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但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如孩子教育、医疗支出、住房压力、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在面对重大不利冲击时也显得异常脆弱,不敢消费。政府应当重视人们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切实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存焦虑,提升他们在面对重大不利事件时的韧性。

第四,提高女性的就业稳定和收入稳定,激活女性消费潜力。本文研究发现,重大不利冲击对女性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在经济复苏周期中,消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女性消费群体又是重中之重,女性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深刻影响着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但女性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比如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等问题,这就制约了女性消费潜力的释放。后疫情时代扩大内需也应更加重视女性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第五,积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从供给侧提升消费质量。本文研究表明,使

用数字支付可以缓解重大不利冲击对个体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和服务的深度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内循环。比如构建以实体企业为主体、覆盖全产业链的新兴产业组织平台,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满足“消费高质量需求”提供高质量产品供给,扩大消费。

参考文献

- [1] 刘洪波,邸建亮,王冉.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统计研究,2022,(5).
- [2] 李柳颖,武佳藤.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形成机制分析.消费经济,2020,(3).
- [3] 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经济研究,2011,(8).
- [4] 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经济研究,2012,(2).
- [5] K. S. Chan, J. T. Lai, T. T. Li. Cultural Values, Genes and Savings Behavior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2, 80.
- [6] W. K. Sun, X. H. Wang. Do Relative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the Villages of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49(4).
- [7] 杨琦,尹华北,张振环.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西部论坛,2020,(5).
- [8] 王小华,温涛,韩林松.习惯形成与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验证.中国农村经济,2020,(1).
- [9] 臧旭恒,陈浩,宋明月.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20,(1).
- [10] 章元,刘茜楠.“活在当下”还是“未雨绸缪”?——地震对中国城镇家庭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金融研究,2021,(8).
- [11] 徐璋勇,边天齐.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消费经济,2023,(2).
- [12] 姚东旻,许艺煊,张鹏远.灾难经历、时间偏好与家庭储蓄行为.世界经济,2019,(1).
- [13] M. Filipiński, L. Jin, X. B. Zhang et al. Living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n Earthquake on Savings and Spending Behavior.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16.
- [14] 姚东旻,许艺煊.自然灾害与居民储蓄行为——基于汶川地震的微观计量检验.经济学动态,2018,(5).
- [15] U. Malmendier, S. Nagel. Depression Babies: Do Macroeconomic Experiences Affect Risk-tak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1).
- [16] G. Rao. Familiarity does not Breed Contempt: Generosity, Discrimination and Diversity in Delhi Schoo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3).
- [17] F. D'Acunzio, U. Malmendier, J. Ospina et al. Exposure to Grocery Prices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1, 129(5).
- [18] S. B. Billings, E. Chyn, K. Haggag. The Long-run Effects of School Racial Diversity on Political Ident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1, 3(3).
- [19] 喻崇武.“大跃进”危机的触发:“浮夸风”与急功近利.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
- [20] 李子超,卢彦.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 [21] U. Malmendier. Exposur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Why Personal Histories Matter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1, 19(6).
- [22] C. D. Carroll, R. E. Hall, S. P. Zeldes. The Buffer-stock Theory of Saving: Some Macroeconomic Evide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2, 2.
- [23] C. D. Carroll.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1).
- [24] U. Malmendier, L. S. Shen. Scarred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24, 16(1).
- [25] 易桢,朱超.人口结构与金融市场风险结构:风险厌恶的生命周期时变特征.经济研究,2017,(9).
- [26] Y. Chen, Z. Y. Fan, X. M. Gu et al.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11).

- [27] 岳崴,王雄,张强. 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10).
- [28] Z. M. Cheng, W. Guo, M. Hayward et al.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he Propens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1).
- [29] M. Olson, M. J. Bailey. Positive Time Prefer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1).
- [30] A. Bandyopadhyay, L. Begum, P. J. Grossman.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tability of Risk Attitudes.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21, 63.
- [31] S. A. Kolakowsky-Hayner, Y. Goldin, K. Kingsley et al. Psychosocial Impacts of the COVID-19 Quarantine: A Study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59 Countries. *Medicina*, 2021, 57(8).

The Impact of the Experience of Significant Adverse Events On Individual Consumption

Li Hui (Zhengzhou University)

Ye Chush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onsumption serves as a pivotal force propell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nsumption has remained sluggish. The three-year experi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may have potentially altered individuals' propensity to consume, affecting both current and future consumption. The Great Famine of 1959-1961, with its vast scope and extended duration, occurred long ago, therefore it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significant adverse events like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individual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Great Famine reshaped the risk preferences and time preferences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it, leaving a lasting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consumption levels. This impact wa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hree specific groups: individuals from households without stable income, those from households in the middle socioeconomic stratum, and female survivors. However,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payments could mitigate this adverse effect. Therefore,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calls for measures to reduce economic uncertainty, vigorously promote stable income growth for residents, especially women, alleviate the living pressures on middle-income group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consumption economy; sluggish consumption; experience effect; the Great Famine; propensity to consume

■ 作者简介 李 慧, 郑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河南 郑州 450001;

叶初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杨 敏